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的地域身份与文化认同感不断上升,推动城市史研究与城市传记书写的进一步兴旺。近年来,全国出现了“城市传记”的书写热潮,《北京传》《南京传》《上海传》……在此背景下,有了蒋蓝的《成都传》。蒋蓝在古代训诂学基础上写作《成都传》,加以中国的风物研究和西方的博物学研究,可谓风物写作的一次扩展和创新。

为成都立传 重新发现不一样的成都

每一座城,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城市传记是城市的文化史,也是其性格形成史。近年来,城市传记写作在中国显示出前所未有的蓬勃之势,出现了《北京传》《南京传》《广州传》《上海传》等众多城市传记。在这股热潮中,成都日报社编辑、文化学者、四川省作协副主席蒋蓝以作家之才情与史家之宏愿,推出其“蓄谋已久”的《成都传》。

《成都传》是目前国内已经出版的20多部城市传记里,篇幅最为浩繁的一部,从春秋时代古蜀王朝移居成都平原起,写到1949年为止,全书计100万字,含300逾幅珍贵图片。有别于一般的“城市传”,蒋蓝没有将《成都传》写成城市的传奇故事,而是调动了他多年浸淫于田野和书斋的知识储备,以他擅长的非虚构手法,究古蜀王国天人之际,通千年成都古今之变,厚积后发,第一次全面、系统、深入、翔实地展现了从蜀山、古蜀国、秦代蜀郡至1949年,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4000多年历史的嬗变。

在书中,蒋蓝涉笔成趣,他像这座城市的向导一般,驾轻就熟地带领读者走进历史的“冷巷”,将成都这个“传主”从历史的尘埃中彻底唤醒。《成都传》将重要历史人物的情感踪迹与空间足迹,作为全书的复线结构,呈现出浓郁而独特的西南气质与诗性空间结构。在蒋蓝笔下,汉代文学大家司马相如不再是一个被神化的空洞名字,而是一位有血有肉、勇于追爱的奇男子;道家祖先严君平的神秘面纱被揭开,其智勇双全的游侠形象跃然纸上;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巨擘扬雄也会为口吃的毛病所困扰……蒋蓝说,成都是有眼泪的,是有爱情的,所以他像写人物一样,讲述成都的七情六欲,正如作家阿来所评价,“《成都传》是充满了历史温情与在场叙事的文学城市传记,发出了明亮而清晰的‘成都声音’。”



混血&韧性

公元前141年,文翁在成都南门创办“石室精舍”,广招弟子,大兴教化,这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早的地方官学体系。经历了2000多年的变迁,石室至今仍发挥着它强大的教育功能,这便是位于成都文庙前街石室中学的历史渊源;成都是中国唯一的3000年城址不迁、2500年城名不改、城市中心未移的历史文化名城;成都也是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的诞生地,在世界货币史上留下了第一道强有力的划痕……

诸多世界之最、中国之最在成都发生。蒋蓝认为,成都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为成都城市形成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创造了先决条件。成都雨量充足、水系发达、土壤肥沃,还有“华西雨屏带”的特殊原因,成都平原的生物多样性和丰富性,要大大高于别的地区。生物多样性孕育了文化多样性,加之之历

史上持续出现的区域和民族移民,给这座城市不断注入活力。“每一次移民都是一次新鲜血液的注入,对居住在这座城市的人的智力、财富和创造性进行了一次‘混血’,而‘混血’越高的地方,越充满生命力和吸引力。”

在《成都传》中,我们可以看到成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沧海桑田,历劫而不衰。“2500年来,无论成都遭受了怎样的战争洗礼与自然灾害,其带来的物理痕迹和心灵痕迹都会随风飘走,成都的历史也从未因此中断。它是一个可以从短暂衰落中奋然崛起的超级城市。”蒋蓝说,“成都拥有一种于极度纷乱的无序中寻找阶段性有序的能力。”在他看来,这一切彰显出成都清晰的“城市韧性”。当蒋蓝得出这一思考,再将目光投射在城市的砖石和阡陌之间时,笔下便涌现了一座极具独特精神的“韧性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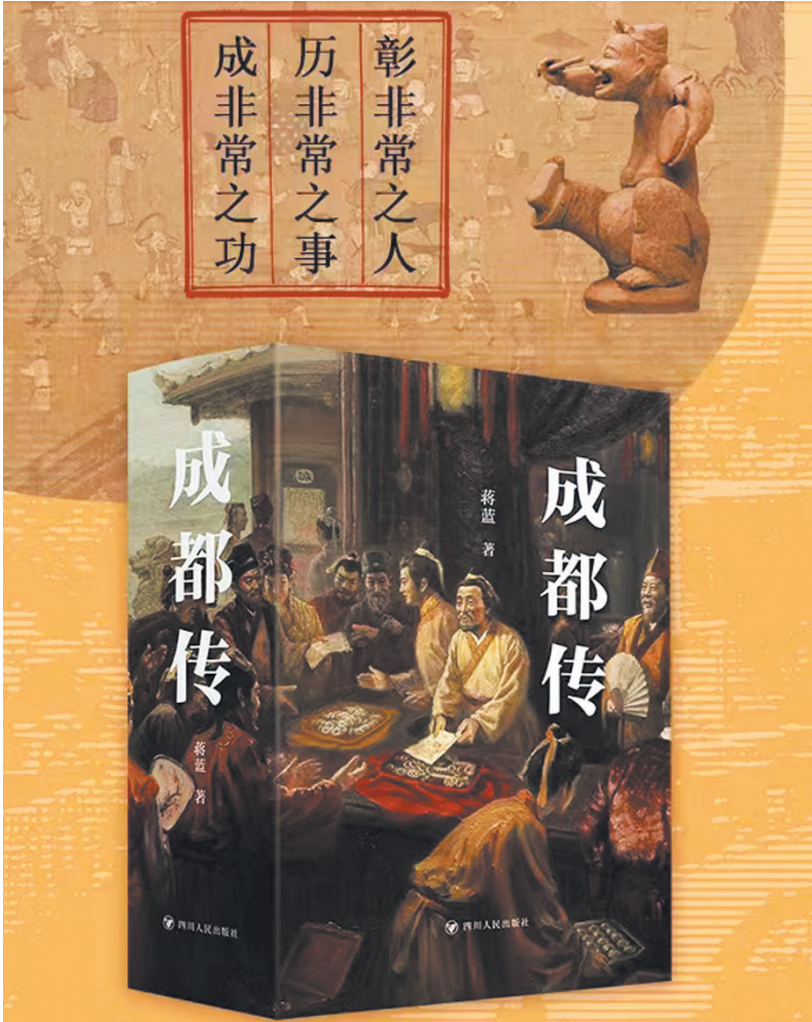
诗意&美学

在后工业时代的氛围中,我们开始考虑一种人文的追问——人到底应该生活在什么样的城市?对蒋蓝来说,成都无疑是最佳答案。在蒋蓝心中,一座城市最高的境界是“诗意”,通俗而言,便是指这座城市有独特的美感和诗意,任谁看了都愿意去品味它,感受它与众不同的魅力。

在这本皇皇百万言的城市传记中,处处飞舞着蒋蓝特有的诗意笔调,他浓墨重彩地书写了成都2500年来深厚的诗文积淀和诗意氤氲的城市气质,凸显成都作为浪漫之都的人文风情。《成都传》不仅有古蜀帝王望帝化为杜鹃鸟的悲情故事,有西汉大文豪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唐代诗人元稹与薛涛的浪漫爱情故事……还展现了唐宋时成都诗歌的高度繁荣和骄人成就。唐代众多著名诗人先后在成都生活或游历,为成都写下无数动人的诗篇,勾画了中华传统诗歌在成都发展繁荣

的恢宏图景。尤其是唐代诗人在成都的诗歌创作,是成都文学及诗歌发展的高峰,滋润了巴蜀大地的文化沃土,陶育了一代代巴蜀文人,也熔铸了城市的诗意氛围和人们的诗性。蒋蓝在序中所言:“诗歌并不是非要写在纸上,诗更多是一种持续的生活方式。唯有将纸上之诗与生活之诗彻底交融,方为成都独有的城市魅力。”在天府书展《成都传》发布会上,一位读者说道,“《成都传》是读人、读人心、读史迹、读风物、读天与地、读诗意成都、读成都自古的性格和味道。”

诗意是蒋蓝解码城市生活美学的重要文学入口,今天,当我们行走在浣花溪边,扑面而来的除了早春花香,还能遥想千年前一位武功高强的丽人——浣花夫人,在此演绎了一曲跌宕起伏的“浣花洗剑录”,从而感受到历史细节与现代城市意象与景观的互相碰撞,生发出新的意蕴。



访谈

蒋蓝:从成都客到《成都传》



蒋蓝在龙泉山考察桉木树

谜面是兴趣,谜底是“风物”

记者:您不是成都人,是这座城市的“他者”,能谈谈您为成都立传的缘故吗?

蒋蓝:1991年我来到了成都,住在东门街。当时很奇怪,这里明明是偏西位置,为什么叫东门街?多年后我才知道,这是少城的东门。我开始熟悉并研究成都,跟我爱读杂书有很大关系。那时我常去九眼桥的书摊买书和看书,接触了不少成都街巷故事,慢慢地注意到了这座城市历史上各种各样的人。当时只是凭着兴趣,未曾想过要写成都。

2000年前后我正式在成都定居,那时候我在写动物和植物,注意到成都有很多重要的风物,却一直没有研究专著,风物研究在成都十分薄弱。于是我开始从风物的角度关注成都,研究成都的杜鹃、乌鸦、槐树……包括杜甫诗歌中提到的“桉木”。之后我写的《极端动物笔记·动物哲学卷》《极端植物笔记》《豹典》等都涉及成都平原周边风物。

风物,让我对这座城市产生了强烈的兴趣。2004年我开始在成都晚报当编辑,有关成都所有方面的资料,我都尽量买和读,同时也不止一次地去探访成都所有的文化点位。在这一过程中,我对成都的历史认识得到了强化,也可以说是一种“恶补”。不过人物、街道、风俗掌故是城市文化中很小的组成部分,那时候我还缺乏更高的整体观去思考一座城市。

说实话,我是到了50岁才真正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在研究成都的城市文化过程里,我读了很多学者、作家的著作,很多研究对我颇有裨益。但我也发现,有很多研究不能“落地”,过于抽象,他们依旧在用西方的城市文化研究方法来研究城市。怎样在西方城市文化研究的模板外,找出一种自己认可且符合成都城市气质的方法?最后我选择的是“人”,把街道建筑、风俗名物通过人的方法来激活。

不是城市志,是文人武士百人“传”

记者:成都2500年的城市历史文化,体量极大,您在写作中是怎么取舍的呢?

蒋蓝:关于成都的通史基本上都是几百万字的体量,如果我将其压缩成一两本书,那它只能是一个成都简史,这也不是我

心目中的成都传。“传”必须是文学演绎,具备高度的可读性。我要从文学的向度去叙述,要有起承转合,要有故事的结构逻辑。同时,我对此书的写作是基于中国古代的训诂学,并在此基础上加以中国的风物研究和西方的博物学研究。我想这对中国的风物写作也做了极大的扩展和创新。

只有对史料非常熟悉,才能写出可读性强的历史传记。我既不能写成文物报告,也不能写成文人故事,这也是写城市传记的作者常犯的错误。自古文人例入蜀,文人虽然重要,但一座城市不是由文人单独支撑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节制对文人过度地树碑立传,不能以偏概全,成为一个文人的成都。所以在书中,我讲到很多武人,高骈、骆秉章、丁宝桢、苏廷玉……你读过《成都传》后会发现,我着重讲了100个人的故事,有详有略。举个详细的例子,就是司马相如。我用14000多字来写他,过去我们对他的了解多为文学和爱情故事,但他作为一个“战略家”的身份却没有得到重视,他用非战争的方式把上百个民族的西南边境纳入了大汉版图。我们过去仅仅称他为“外交家”,实属“矮化”。

还有,前蜀的后主王衍在历史上被称为“亡国之君”,我不愿简单将其定性。从历史上来看,四川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最佳时期正是前后蜀时期,老百姓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文化也得到了空前发展,中国第一部词集《花间集》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级的花苑也产生了……这些跟那时蜀地国泰民安、丰衣足食有很大关系,我实事求是地将他们对蜀地的贡献悉数写出。我们应该在城市传记里重新思考这些重要的历史人物,我也应该在这本书里有自己的价值判断。

对苏东坡进行工笔式描摹

记者:请介绍一下您正在写作的《苏东坡辞典》和《苏海鲸波:苏东坡传》?

蒋蓝:近20年来汉语领域有“拿来”的几种词典式写作的成品,比如福楼拜的《庸见辞典》、米沃什的《米沃什辞典》等。我写《苏东坡辞典》是以111个按音序排列的词条,完成对苏东坡重大地缘、事件的工笔式描摹,力求对苏东坡进行另辟蹊径的深刻解读。苏东坡的文化成就已不是一个文人的行为,我在《成都传》中也写道:“毫无疑问,千古以来我最喜欢的一个文人就是苏东坡。”苏东坡在中国历史中就像一片浩瀚的“苏海”,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后世把苏轼称为伟大的文学家、政治家,我认为他更多是中华文化的道德典范。面对诸多复杂的人生处境,东坡身上体现出强大、坚韧、超然的人格力量。即便在最坎坷的时候,家国情怀令他的智慧无处不在。他走过全国70多个城市,可能是中国文人中行路最远的人;他为人光明磊落、公道正派,在70多座城市留下了中国人独特的生存智慧、生命智慧,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



Focus 聚焦



2023年2月10日 星期五

深读

用传记打捞城市基因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催生以城市为单位的地域身份与文化认同感上升,认同汇聚的结果,就是城市史研究与城市传记书写的进一步兴旺。2016年,英国作家兼记者彼得·阿克罗伊德写的《伦敦传》由译林出版社引进并出版,自后,中国出现了书写“城市传记”的热潮,如《北京传》《南京传》《上海传》……

为何城市传记会成为一股热潮?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剑晖认为,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大家迫切需要重新认识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城市,而城市传记有助于人们厘清个人与城市、家与国、传统与现代这三重关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也养一方水土。关注城市,实际上也是关注某个时空下的我们自己。”

对于中国的文学书写实践而言,城市传记无疑是一种新鲜的文体,它打破了过去传统传记文学以人物为传主的限制,将城市纳入书写视野。“传记”所具备的文学与史学的双重属性,不仅需要参考大量相关史料进行写作,还可以在史料基础上,展开适当的想象与虚构。为一个城市写一本书,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撰写一部人物传记。如《伦敦传》的作者彼得·阿克罗伊德所说,“伦敦是一个神秘的身体,这个形象奇特又卓绝,这个意象可追溯到城市之神的图像……也可被想象为年轻男子,伸展两臂作解放状,这个形象源自一尊罗马铜像,却充分展示了一座以磅礴的进取精神和自信永远在开拓的城市。”

城市传记极易掉入“文化旅游读本”的窠臼,或沦为地方志、考古资料。城市传记作为文学作品,既不是单纯的旅行指南,也不是历史史料,比起地方志,它多了人文情感,多了历史细节,多了人间烟火味。在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卫国看来,“城市传记就是用讲故事的方法,勾勒一座城市的灵魂。”灵魂不是凭空出现的,是有遗传基因、有遗传密码的,城市传记应该去寻找、打捞这些基因和密码。比起物理意义上城市的存续,一座伟大城市的传记,铭刻的是精神、气质和灵魂;也只有城市的传记,才能在全球日益趋同的城市面貌之外,彰显城市真正的品质和内蕴。

《成都传》的写作并没有遵循一般城市发展史的逻辑,呆板地堆砌史料,而是用文学手法搭建了许多让读者兴奋的历史场景,让读者感受到历史演进的脉络,充满戏剧性和文学感。蒋蓝希望用《成都传》彰显成都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温情:“自此出发,成都将放眼更广阔的世界。它的心中,是穿越历史风云的人文底蕴和教育底蕴;它的脚下,是推动历史前行的创造基因和前瞻基因。”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泽登旺姆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